



老子非东周图书馆馆长之议

——兼论《道德经》思想材料的来源

◎ 韩 华

【摘要】 老子为“东周守藏室之史”——是图书馆的馆长或者是管理图书的小官的身份，这是文化学术界较为普遍的认识，其所据者又基本上依老子所著之《道德经》，以为恢宏的思想巨著必定有一个博大的资料库为其思想形成的材料来源，该认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它对历史的真实、图书与档案根本不同的特性、图书馆与档案馆不尽然相同的性质与对先秦前文化知识体系的准确认识，均产生了一定的模糊与混淆。本文试图对《道德经》的思想材料来源进行准确完整的认定，以便于清楚把握《道德经》思想体系的形成前提。

【关键词】 老子；守藏室之史；图书馆；档案馆；道德经

【中图分类号】 B2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0)04-0096-5

司马迁《史记·老子列传》言：“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后人就此而将老子定为“周朝管理国家藏书的小官”^[1]，并由此衍生为普遍的认识，后人据此更深信不疑，普遍又将老子的“守藏室之史”定为东周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图书馆馆长当然是最博学的人”^[2]。而《辞海》中“老子”的词条是“做过周朝‘守藏室之史’（管理藏书的史官）”，但未对“守藏室”进行图书馆的专门定性。

细心思考上述有些定论，觉得似乎存在牵强附会之嫌，牵强者以为老子为国家图书馆馆长、坐拥

书城，其学问因此而博大精深；附会者则在于认定“守藏室”就是图书馆，把“守藏室之史”认为是收藏史书和管理图书的专职官员，并进而认为是东周国家图书馆馆长，似乎这样才适合《道德经》著者的身份。

但周之守藏室是不好随意就认定为国家图书馆，更不能随便以为“守藏室之史”就是管图书馆的官，或者为国家图书馆馆长；再进而言之，即便周之守藏室就是图书馆，那老子又能管到些什么呢？笔者以为先秦以上，并未有完整思想体系成为了“书”的著作需要老子去管。

〔作者简介〕韩华，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北京 100181。

而正因为如此,图书是什么?图书馆是什么?图书馆的功能又是什么?东周之时有没有图书馆?老子所居的“守藏室”是什么?老子的“守藏室之史”的职能又是什么?老子依据什么样的资料进行其《道德经》的哲学思考?又根据什么样的知识信息源形成老子《道德经》的思想体系?而所有这些问题的提出,就有了完整意义,至少是对先秦历史进行一点必须的实事求是的思考。

在我们弄清图书馆是什么之前,必须搞清楚图书是什么,《现代汉语词典》给出的定义是“图片和书刊,一般指书籍”^[3]。顾名思义,图书馆当然是集中收集、馆藏这些图片和书刊、书籍,并能够服务读者的专门地方。

“图”字的古义之解是“特指河图,谓古代关于符命、预言之类的神图”^[4]。《周易》所言“河出图,洛出书”^[5],是传说伏羲氏时,黄河有龙马负河图出现,有神龟负洛书从洛水出现,这说明与图、书相对应的神秘的文化关联。“书”字的古义解释有三,其一是写、记载;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有“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6]。其二是文字,《荀子·解蔽》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7]其三是书籍,《论语》中子路与孔子的对话:“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8]《论语》又载:“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9]此明确了书即为知识文化传承的载体,是教化和影响人的圣传经典,是能够指导社会政治建设和施行政治方略的治世典略。而对书籍内涵较全面认为的是韩非子,他说:“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录功于盘盂……”^[10]

书的定义由此定性,也就是说有了书的完整特性的出现,才可能说图书馆存在的意义,才有了内容为“搜集、整理、收藏图书资料供人阅览参考的机构”^[11],这种从概念到功能二者兼具的完整意义下的图书馆。

至于“守藏室之史”的“史”,《孟子·离娄下》说:“晋之《乘》,楚之《梲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12]“史”

字之义就是历史、史籍。《礼记·玉藻》则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13]这里“史”字,其本意是史官。许慎《说文解字·史部》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14]而王国维先生认为“从又持中”的“中”字是“盛筴之器”,而筴是简策,那么“史”字的本义则为“持书之人”,“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15]。王国维弟子姚名达则以为:“‘中’是‘I’形笔和‘口’。而口是语言的意思。而‘史’字形是从手持笔,置于口前,象征文字补充语言的不足。其本意是载笔为书、正辞立信、执技以事上之人。”而折中来看,作书之事与载笔为书并没有多大的歧义。《左传》记“史为书”^[16]。《礼记》载“史载笔”^[17],也就是“持笔作书”的原义。

综上引论,可以说明“史”是动作的关系,而动作关联着做什么?是做册、记事,并非专指管理图书,而且,更多的是记事、记述动作的原义,可以是依据其资料而进行。

依据上文所述“史”之概念与功能特点,东周时期系统完整的书有哪些?没有或者很少?也许就历史意义上论,图书和档案并没有专门的分类与定义,但如果关涉到老子《道德经》思想材料的来源,那么,对老子的材料来源究竟是图书还是档案,就存在分清楚的必要性,而且必须是历史的认真分辨。正因为如此,我们对老子为“守藏室之史”,即东周管理国家图书小官或图书馆馆长的说法存疑,存疑之前提为:东周时期如果没有特别系统完整的书,那么,东周之时的图书馆收藏什么?图书馆若没有收藏图书,那么“守藏室”又应该是什么?老子所担任的官职与职能应该是什么?为什么后人要将老子定论在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位置上?不言而喻,这些问题自然均与老子所著之《道德经》有关,然而,如果认为老子著《道德经》这样伟大的哲学著作与老子为图书馆馆长——此二者间有着特别的互为关系,这就显得有点勉强了。

我们知道,任何思想观念形成为能影响社会几千年的知识体系,其思想认识起点与当时社会发展——二者间应该有着特别的关联,其思维也自然会与当时有着影响的知识系统发生关系,这一点可

从老子遗留于世的《道德经》中直观的反映出。然而，早于老子所处时期完整的书是什么？什么样的系统书籍能够影响老子在当时的知识系统上完成哲学诗五千言的写作？我们知道，早于老子之时的“诗”，在当时应是根据王室要求，广泛被搜集存放，《国语》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18] 其搜集诗歌之目的，主要在了解人民的反映，考察其政治效果，即所谓：“……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19] 至于先秦时的经典，后世所考，除箕子述《洪范》，后世记有《尧典》、《禹贡》、《世本》等，以及为龟甲占卜对应的《易》，以至在西晋时从古墓中出土的《竹书记年》等等，实在是寥寥无几。而此等所谓之书，也大多是记述帝王、诸侯、卿大夫的世系、属地、姓氏、制度的缘起，以及对诸侯国间发生的各种事件的记述，再或者是对占卜凶吉祸福的记述。可见，此间的书，其实更多些档案的概念。就搜集民间的各类具有文化意义的东西，也没有完整的书籍意义。著名学者柳诒徵说：“庄子虽有翻十二经之语。而先秦诸子引据《诗》、《书》，未有以《诗经》、《书经》称者。”^[20] 冯友兰、罗根泽等大学者也曾站在反对《道德经》为老子所著的立论上，提出战国前无私家著作和私人著述等。所有这些，均反过来说明在当时并不存在专门性的著述。从古文字学看，尽管已出土了数量巨大的甲骨文，但甲骨文“绝大多数都与占卜有关，称为卜辞”^[21]。再则是篆刻在彝器上的金文。李学勤先生在《纸以前的书籍》专门说到：“必须说明，无论甲骨文还是金文，都不能叫做‘书’，因为甲骨文只是占卜的记录，金文只是青铜器的铭文，它们都是附属于有固定用途的器物的。就象不能把后世的石刻称为‘书’一样，甲骨文、金文也不属于书的范畴。”^[22] 尽管商代似乎确有书存在的记载，即所谓“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23]。证明商代已经存在“记录”史实的典册，商、周两代并有书写掌管典册的官称做“作册”，但这些也仅限于对事件的记录。成语“书于竹帛”的“帛”，乃昂贵之物，就推测也只能是用于王言的记述。惟多以竹木做册牍记事，方是当时的书

矣，而书之所记其实也只是当时发生于各诸侯间的事，而当时治世需要的律法之义，也铭于铜鼎，后人称为刑鼎，这些皆不能谓之文以载道之精采学问和思想的专门著述。

所以，这在当时老子所著《道德经》，是不大可能“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24] 使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5]。司马迁为老子作传，也许由于其相隔时间久远，据当时所有的材料说了这样的话：“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逐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26] 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莫知其所终。从字里行间，我们读到的老子“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见周衰，目睹了周朝由兴至衰，而老子目睹兴衰后的所有思考便形成《道德经》——这部中国哲学精粹的传世经典，而老子正好不是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官员或者馆长在博览穷思后完成其《道德经》五千言的著述。

那么，老子的“守藏室之史”应该是什么？最贴切并与当时时代最接近的应该只能是档案馆，而对档案的解释是：“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者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贮年久者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27] 尽管这是清人对档案一词的描述，但中国档案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起于40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档案一词在商代曰“册”，周代称“中”，秦汉叫“典籍”，可谓对“守藏室”实际守藏内容的对应，以此推论“守藏室”只能是东周国家档案馆。而这一点可从《道德经》的著述风格求证，可以肯定，当时被广泛收集存放的诗，对老子其哲学诗《道德经》的风格形成具有显著的影响，而存放于“守藏室”的所有反映诸侯与王室活动记载的典册，恰恰成为老子“居周久、见周衰”所反思和批判的材料。这从老子在《道德经》中针对当时统治者大量可见的典册中自以为是的“智”而提出“弃智”见解，可以看出老子清醒思想中隐埋的愤怒，所以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28]，他一针见血的提出“绝圣弃智，民利百倍”^[29]。

从“守藏室”大量的档案材料中,老子直接看到统治者的贪婪和虚伪,看到大量的伪装、丑行与恶举,从材料现象到事物本质的发展变化中分解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并辩证的提出了在万事万物中相互包含着的对对互为转化的关系,有和无、生和死、长和短、高和下、多和少、大和小、前和后、远和近、轻和重、静和噪、难和易、黑和白、雌和雄、正和反、同和异、真和伪、美和丑、善和恶、强和弱、福和祸、荣和辱、智和愚、吉和凶、是和非、贵和贱、治和乱、刚和柔、胜和败、清和浊等相互依赖、相生相成又相形相亲、并相和相随、彼此对立着、又转换着的矛盾事物。只有清醒于事物相互包含转换转化的认知中,才能有真正的智慧,才可能“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30],才能够“知人者智,自知者明”^[31]并做到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荣守辱^[32]而归朴返真,使达到“知者不言”^[33]的真知,则“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34],达到遵循规律把握规律的境地,将有限之知求道的获得,是以“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35],为此才能从“知身”、“知乡”、“知邦”、“知天下”,获得“知常曰明”的状态,达到对“道”与“德”的体认,而体认者首先要能够摆脱普遍的贪念和俗为,使获得直指人心而问道的耳聪目明之状态。

一般的说,先秦博学者的博学应来源于勤思,更来源于建立在直接信息下的真实完整的思考。老子的见解源自长期在档案馆直接对事实记载典册的熟悉,来源自占卜之易的记述,来源于搜于民间的诗歌唱辞,何见于所谓专门的论言著述呢?而如果不是针对具体的实际情况,进行全面完整的综合思考后形成人文思维体系的全面建构,博大精深的《道德经》就不会成为引导后人结合实际深入思考的哲学精粹。老子著《道德经》是对人的思考,人与人关系的思考、人和社会关系形成前后的思考,以及人和自然关系的思考,他对人类思想和行为先天的缺陷与生俱来的描述,更应示着人后天的发展变化必然应势而来,亦步亦趋都有着难分难离的人

性弊病。老子此所言,是居于“守藏室”所见,并针对王道而言的天道,而天道则是《道德经》开言所见“道,可道,非常道”^[36]。

非常之“道”则是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的坐标,老子提出的“德”则是引导人努力向上的思想方法。而老子“道德”思考的全部,难道不正是要求人们结合现实实际,遵循事物规律、把握事物发展方向的哲学思维模式和哲学思考的方法论吗?如果我们思考问题总是脱离实际,总是想当然的自以为是,无论其谁的聪明自持,也势必将出现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误差。现实生活中已有不少这样的实例。诚然,自战国始,分崩离析的社会政治局面使社会思想多元化,出现了百家之学的争鸣局面,而此时的学人更强调要针对性和结合实际的学习,所以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37]更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38],但凡持经典而一成不变的读死书、死读书者,后人诟病为书呆子或书蠹。现实生活的人文意识和科学认识的开端正是针对现实实际的格物致知,是观察和实验、综合与抽象。一旦离开这些,一味的迷信经典,持书为据的循规蹈矩,势必会被现实无情的碰个头破血流,后人故有信书不如无书的慨叹。其论不遑文不对题,是再对广泛的以为老子是东周图书馆馆长俗见的再论。以为老子思想的形成自然是建立在一个书海文山,这种偏见有必然的认识基础。其实从战国起到秦始皇焚书止,建立图书馆的基本指导性书籍到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才典校秘书,编定目录,写出《别录》、《七略》,开启了中国图书目录学之始,而藉此再证明了东周守藏室实在不是什么图书馆,最多只能算为早期的档案馆。写出传世大著的老子自然也不会是什么国家图书馆长,这才是当时老子历史身份的真实。老子的《道德经》内容形成,的确只是在一大堆完整的事实历史的档案记述中,开拓出了思想的真实辉煌与博大精深。在为老子的“守藏室之史”正名为档案馆官员后,研读起《道德经》,才更能够理解老子文辞玄虚和幽深背后的为什么。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撰,韩兆琦主译.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M].中华书局,2008.318,1319.
- [2] 谢谦编著.国学词典·哲学·人物·老聃[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88.
- [3]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M].商务印书馆,2003.1275.
- [4] 张双棣,陈涛主编.古代汉语字典[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801.
- [5] 黄寿祺,张善文译注.周易(下)系辞上[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92.
- [6]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M].1638.
- [7] 安小兰译注.荀子·解蔽[M].中华书局,2007.228.
- [8] 杨逢彬,杨伯峻译注.论语·先进[M].岳麓书社,2007.102.
- [9] 论语·为政[M].15.
- [10] 韩非子校注组编写,周勋初修订.韩非子校注·大体[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247.
- [11]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M].1275.
- [12] 金良年撰.孟子译注·离娄下[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78.
- [13] 杨天宇撰.礼记译注·玉藻[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492.
- [14] 许慎撰,徐铉等校.说文解字·卷三下·史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40.
- [15] 王国维著.观堂集林·释史[M].中华书局,1959.263-264.
- [16] 左传译注·襄公十四年[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716.
- [17] 杨天宇撰.礼记译注·曲礼上[M].35.
- [18] 左丘明.国语卷第一·周语上[M].齐鲁书社,2005.5.
- [19]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M].中华书局,2005.1355.
- [20] 柳诒徵撰.柳诒徵说文化[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61.
- [21] 李学勤.古文字学十二讲·甲骨学基础知识[J].文史知识.1985,(1).
- [22] 李学勤.古文字学十二讲·纸以前的书籍[J].文史知识.1985,(6).
- [23] 李民、王健撰.尚书译注·周书·多士[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309.
- [24] 史记·伯夷列传[M].1304.
- [25] 汉书·司马迁传第三十二[M].2068.
- [26] 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M].1318.
- [27] 柳边纪略·卷三[M].杨宾撰,中华书局,1985.55.
- [28] 冯达甫译注.老子译注·卷上[M].第十八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4.
- [29] 冯达甫译注.老子译注·卷上[M].第十九章.36.
- [30] 冯达甫译注.老子译注·卷上[M].第三十二章.36.
- [31] 冯达甫译注.老子译注·卷上[M].第三十三章.65.
- [32] 冯达甫译注.参见老子译注[M].卷上·第二十八章.55.
- [33] 冯达甫译注.老子译注·卷下[M].第五十六章.110.
- [34] 冯达甫译注.老子译注·卷下[M].第七十二章.140.
- [35] 冯达甫译注.老子译注·卷下[M].第五十三章.104.
- [36] 冯达甫译注.老子译注·卷上[M].第一章.1.
- [37] 论语·为政篇[M].第二.13.
- [38] 论语·公冶长篇[M].第五.40.

(责任编辑 邹一清)